

漢學學人專訪——林春城教授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Yim Choon-sung

廖 箴 (Liau Jane) *

一、前言

林春城 (Yim Choon-sung)，韓國籍，係韓國外國語大學中文博士，研究領域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理論和小說）和中國大眾文化及城市文化，此次受漢學研究中心來臺獎助的研究主題為「通過楊德昌電影探究臺北文化認同」。林教授現為韓國國立木浦大學人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化系教授，博士班導師，曾任系主任、亞洲文化研究所所長、人文學院院長、教授評議會副議長以及韓國中國現代文學學會會長等職務。

林教授主要著作有《小說現代中國》（1995）、《中國近現代文學史話語和他者化》（2013）、《王曉明》（2016）、《Post 社會主義中國的文化認同與文化政治》（2017）、《李澤厚》（2018），中文著作有《新世紀韓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與王光東共編著，2012），譯書有《中國近代思想史論》（李澤厚著，2005）、《中國近現代文學運動史》（編譯，1997）、《文學理論學習》（1991）、《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史》（范伯群著，合譯，2015）、《中國通史綱要》（白壽彝主編，合譯，1991）、《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發展初論》（合譯，1991）等。有關臺灣的研究論文有〈在韓國的香港·臺灣大眾文化之接受和中國大眾文化之教育〉、〈城市暴力的偶然性與匿名性：讀解楊德昌的《恐怖分子》〉、〈Post 冷戰時期臺灣文學／文化的身份認同〉、〈作為

上海民族誌的〈色，戒〉〉、〈千迴萬轉：張愛玲學重探〉（林幸謙主編，2018）等。

二、學思歷程

問：首先請談一下您的治學經歷，為何會對中文產生興趣，而從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呢？

答：我是 1977 年入讀韓國外國語大學中文系的，期間曾去當兵，1980 年秋天復校，在韓國外國語大學讀完碩士、博士，考上碩士班後，有一位老師推薦了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要求讀幾遍再開始研究。在讀到漢朝司馬遷的《史記》，這才知道中文系可以研究《史記》這樣的書，我的碩士論文「《史記》議論文的內容與技法分析」就是研究《史記》的。

到了攻讀博士階段卻感到有點混亂，因為當時正是韓國民主化運動的高潮期，古典領域的研究與現實之間差距太大，而且



林春城教授

* 作者為國家圖書館編輯、漢學研究中心《漢學研究通訊》主編。

當時的韓國是不允許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認為這是研究共產黨的文學。那時韓國的中文系教授大多在中華民國留過學，而當時臺灣的情況和韓國差不多，研究魯迅是被禁止的，留在大陸的作家大多也不能研究。因此，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的是古代文學。至今為止，韓國的中文系語言學和古代文學佔據著主要的位置。

韓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開始於 1980 年代。當時的民主化運動促使大多數大學生或多或少都讀過馬克思、列寧、毛澤東、金日成的著作。當時毛澤東的影響尤其大，如《矛盾論》、《實踐論》、《新民主主義論》等以及毛澤東思想指導的人民文學也就受到了關注。隨著韓國民主化運動的發展，韓國意識形態地形圖慢慢發生了變化，韓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也隨之發展起來。

問：在您的著作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關於文學史的著作《中國近現代文學史話語和他者化》，可以談談您對中國近現代文學史的研究心得嗎？

答：我對中國近現代文學史的研究有點「走馬看花」，許多作品我沒有讀過，算不得是專家。不過也有旁觀者清的優點，作為一個外國的研究者，我主要想從大的輪廓方面來把握這一歷程。我的主要研究視角是「話語和他者化」（discourse and otherization）。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概念中，有中國新文學史、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國當代文學史、中國 20 世紀文學史、中國通俗文學史等提法和編寫實踐。最近還有朱壽桐教授編了《漢語新文學通史》、嚴家炎教授主編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前者主張漢語文學，後者提出華人文學。這麼多的能指和所指並不一致。我以為能不能追尋現當代文學的起點，究竟起源何時，這一問題可以保留或暫時懸置起來。無論哪一種提法，命名並不是最重要的。

我提出過「東亞近現代」（East Asian Modern），它相當於「West European Modern」。現在是全球化、地域化（regionalization）的時代，從東亞視野來看，東亞的主要國家，如中國、日本、韓國具有相類似的近現代歷史遭遇，即回應西方的挑戰，雖然各個國家的國情和道路選擇並不相同。19 世紀中葉以來，主導世界史的西歐文化同東亞文化開始正式衝突。許多問題從那個時期開始提出，迄今懸而未解。正是基於這樣一種狀況，我

把從 19 世紀中葉起到現在為止的歷史看作是一個「有機整體」，並把它命名為「東亞的近現代」。「有機整體」這個概念是受到復旦大學陳思和教授所提出的「新文學整體觀」的啟發而組成的。以前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主要是由三分法（近代、現代、當代）所統治的。1985 年陳思和提出了「新文學整體觀」而打破了三分法統治的局面。「新文學整體觀」後來與北京大學錢理群教授提出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不謀而合，成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論的主旋律。我提出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有機整體是，從鴉片戰爭到現在的時段當作一個有機整體。我最近寫的文章裡把它叫做「中國的長期近現代」（the Long-term Modern China）。中國的長期近現代又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短期 40 年代：post 社會主義時期，中期 70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長期 180 年：編入於資本主義時期 / 革命和轉型的時期。

中國近現代文學史有很多話語，如新文學史話語、現代文學史話語、20 世紀文學史話語、雙翼文學史話語。新文學史話語遮蔽、抹掉了舊文學和民間文學的傳統和實踐；1949 年以後的現代文學史話語排除了很多右派、同路人作家。這一排除過程就是「他者化」的過程。改革開放以後進行了撥亂反正，「正」的標準就是王瑤先生的文學史。這其實仍然是一個「他者化」的過程。在我看來，中國近現代文學史研究就是不斷進行「他者化」的過程。20 世紀文學史恢復了被排除的右派文學史現象，通俗文學史則恢復了通俗文學的傳統。到 2010 年出現了朱壽桐的《漢語新文學通史》和嚴家炎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朱壽桐、嚴家炎兩位先生的文學史一方面是開放，大大拓展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內涵和領域，但另一方面也顯得過於膨脹。譬如，朱壽桐先生提出「漢語文學」，也包括外國人的漢語寫作，所有用漢語寫作的都是漢語文學。嚴家炎先生將《黃衫客傳奇》作為現代文學的起點，但這是法文寫的。朱壽桐先生沒有談少數民族文學和方言文學。這樣的趨勢或許會造成把中國現代文學等同於漢語文學加華人文學。在這樣的情況下，哈金的作品如何界定？就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問：在求學過程中，有哪位學者或哪本著作對您的研究影響特別大？

答：如同之前所提過的，像是司馬遷的《史記》和李澤厚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司馬遷的著述目標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我覺得李澤厚的學術活動可以歸納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跨中西之界，成一家之言」。

問：您翻譯了李澤厚先生的書，為什麼選擇這本書翻譯？可以多介紹一些李澤厚的思想嗎？

答：中國大陸的新時期一般說是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但就文化學術方面來說，就是李澤厚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和《批判哲學的批判：康德哲學述評》開始的，兩本書就在 1979 年問世的。李澤厚的思想是一言難盡的。他通過自然的人化與人的自然化究天人之際，透過思想史三論（古代、近代、現代）與《美的歷程》、《華夏美學》通達中國思想和美學的古今之變，通過《批判哲學的批判：康德哲學述評》試圖交匯康德和馬克思的同時交叉了西洋哲學和中國儒學而跨中西之界，以致成「人類學歷史本體論」的一家之言。我們可以說，他就是「Post 社會主義中國批判思想的始源」。還有，他提出了許多新概念，例如，文化心理結構、歷史性實用理性、樂感文化、新的天人合一、儒學四期、積澱說、啟蒙和救亡的雙重變奏等等。

問：您的研究經驗和每一階段的研究重心為何？

答：碩士論文的主題是關於司馬遷的《史記》。把它當作基礎學習的話，十年的研究生時期主要研究是「中國現當代文學」，之後我開始關心武俠小說、電影等大眾文化與城市文化。最近也關心翻譯研究與文學人類學。

問：可以介紹您任教的韓國國立木浦大學中國語言文化系在研究及教學上的特色為何？

答：我對電影的興趣是由於教學的原因，因為文學教育學生的反應不大，電影卻有反響。通過電影來瞭解當代中國，如張藝謀的「活著」、陳凱歌的「霸王別姬」、侯孝賢的「悲情城市」、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等。所以，木浦大學中文系慢慢改成以語言和文化為中心的學科。主要開設了「通過電影觀看現代中國」、「通過古代小說瞭解中國歷史」、「通過小說觀看現代中國」、「中國的大眾文化」、「臺灣香港文化」、「中國當代文化入門」等。近年來系上也開設了「文化應用

和 storytelling 協同課程」，這是在博碩士班開設的專業，主要是由一些文學院裡的志同道合的教授協力上課。目前還在實驗性階段。

問：您曾任東亞中文文學網絡重要推手——韓國的「中國現代文學學會」會長，可以介紹一下這個學會嗎？

答：大致而言，韓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包括 1980 年代以前的研究為前期，1980 年代為開拓期，1990 年代為發展期，21 世紀以來則是多元化的時期。

韓國「中國現代文學學會」於 1985 年創立，是韓國唯一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包括臺港文學與華文文學）的學會。其主要刊物《中國現代文學》已經出刊至 86 期。1993 年舉辦了第一屆國際研討會（主題：魯迅的文學與思想）以來，組織了許多國際學術研討會，其中也有「臺灣文學研討會」。這兩三年舉辦了「紀念《魯迅全集》完刊學術研討會」、「中國新文學一百年的成果與展望」、「現代中國觀的含義與其政治經濟學的含義：文化大革命、臺灣的向日葵運動、香港的黃雨傘運動」等。還有出版了一些叢書包括《中國現代詩與詩論》、《魯迅的文學與思想》、《中國現代文學的世界》、《與中國現代文學相遇》、《通過電影解讀中國》、《中國電影的理解》等。

三、來臺研究的主題

問：此次來臺研究的主題是通過楊德昌電影探究臺北文化認同，請問您為何對此主題感到興趣？

答：我曾圍繞「身份認同」的主題，對香港和上海進行了研究，先後出版了《香港和香港人的身份認同》（2006 年，合著）、《上海電影和上海人的身份認同》（2010 年，合著）、《20 世紀上海電影：歷史和解題》（2010 年，合著）、《上海學派文化研究：批判和介入》（2014 年，編著）等。基礎於香港和上海的研究，準備考察研究移民港口城市——臺北的文化認同。研究途徑是透過臺灣電影新浪潮的代表楊德昌的電影作品。這項研究一方面可以擴展我個人的研究範圍，另一方面，通過香港—上海—臺北的研究，可以橫貫考察東亞近代化過程中具有代表性的移民港口城市的文化認同。

具體說，1987年臺灣解除戒嚴，從世界體系出發，與後冷戰（Post Cold-war）的問題意識相關。觀察冷戰時期的臺灣文化，美國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楊德昌的電影中，臺灣文化認同中內化了美國的大眾文化。《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埃爾維斯·普雷斯利（Elvis Aron Presley）是少年的偶像；《恐怖分子》中混血少女的母親對棄自己而去的美軍既懷念和又憎恨，將愛恨交織的情感轉嫁到了混血少女身上，從而形成暴力的根源。最終，臺北匿名性的、偶然性的暴力的根源歸屬於美國了。

楊德昌說，他的目標就是用電影來替臺北畫肖像。他要探尋臺北這些年來發生變化的方式，以及這些變化是如何影響臺北市民的。2007年6月28日楊德昌離世，他的電影集中於臺北和臺北市民。1947年楊德昌出生於上海，兩歲時隨家人赴臺灣，包括留學時期他在美國生活了11年，1981年回到臺灣。第二年主導了「臺灣新浪潮」，穿梭於香港、東京、洛杉磯，他的生活如同遊牧民般，最終在美國過世。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電影從未脫離過臺北。

本次研究的焦點是通過楊德昌的諸多文本探究臺北的文化認同。同時將參考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後現代主義學者及第三世界文化批評家詹明信（Jameson Frederic R.）的有關「認識地圖的繪製」（cognitive mapping）理論，以及美籍電影學家張英進的「全球本土化城市」（global city）概念。

四、未來的臺灣文學研究

問：臺灣文學研究目前在臺灣是非常熱門的，不知道在國際上（或是韓國）對臺灣文學方面的研究看法為何？您認為臺灣文學的研究要怎麼走向國際？

答：在韓國，臺灣文學是作為中國文學的一部分而研究它。如果臺灣文學要走向國際，就加強臺灣文學的特殊性、獨特性。

問：您對於臺灣年輕的研究生，在從事未來臺灣文學研究方面有甚麼建議？

答：最近參加由國立臺灣文學館與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主辦的「第15屆全國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研討會」（2018.10.6-7，國立中興大學）。

整個研討會由6場組成，每場約4個人報告、2個人講評。

我比較關心的是第一場：與東亞連結（1）和第二場：與東亞連結（2），一共8個人報告。第一場的報告主題主要是比較文學，比如陳映真與魯迅、兩岸的後現代論述、兩岸的科幻小說的現代性反思等。第二場的主題名目是「與東亞連結」，但實際上是「華語語系」（Sinophone）。

根據這兩場的報告來說，我發現兩個傾向；第一，他們都沒有東亞意識。我覺得，將東亞與其說成是一種實體存在，不如說成是一種指向價值。因此，試圖接近作為地緣政治學實體之東亞的研究大體陷入自相矛盾之中，反而與之保持距離的同時將其作為知識分子自我反省與解構契機的「作為方法的亞洲」（竹內好）、「作為研究計畫的東亞」（Arif Dirlik）、「作為知的試驗的東亞」（白永瑞）、「作為態度的東亞」（孫歌）、「作為差異之維度（dimension of difference）的東亞」等從構成主義（constructivism）接近的研究各自取得了成果。但報告人大都是從地緣政治學上接近東亞，不太瞭解文化上的接近。

其實韓國是臺灣連結的可能性最大的國家。但是兩個國家只向美國走，不想看對方，尤其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強迫，斷交以後，韓國與臺灣成為互不相關的關係。幸好，最近靠韓流等大眾文化的影響，兩國人民的交流比較多起來。

第二，這兩場報告都受到王德威的 Sinophone 話語的影響。王的 Sinophone 話語基礎於史書美的 Sinophone 文學的概念，是為了批評中國大陸的「20世紀中國文學」而提出的4個「他者」之一。這4個「他者」是，晚清文學和抒情文學，後遺民文學和 Sinophone 文學。我看，前兩者是「20世紀中國文學」的內部他者，後兩者是外部他者。Sinophone 話語是擴展 Sinophone 文學的概念。如果讓它走到底，它就會成為包括「20世紀中國文學」在內的霸權性話語。這樣，歌德所說的世界文學將會由 Sinophone 文學和非 Sinophone 文學組成的局面。作為一個外國的中國研究者，對於組成這樣的局面感到有些擔心。